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清前期中俄关系

◎ 张维华  
孙 西 著



# IXIANG GUANZHONG TUDONG ZHONGQING

◎ 张维华  
◎ 孙西著



413671

SAH 33/07



# 清前期中俄关系

○ 山东教育出版社

## **清前期中俄关系**

---

**张维华 孙西 著**

---

**出版发行：山东教育出版社**

**地 址：济南市经八纬一路 321 号**

---

**出版日期：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用纸规格：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

**11.5 印张 4 插页 245 千字**

---

**制版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

---

**书 号：ISBN 7—5328—2176—5/K·58**

**定 价：17.30 元**

---

## 序 言

放在我面前的这部书稿——《清前期中俄关系》，恐怕是我今生所能致力的最后一部书了。希望在有生之年，做好这部书，是我近年的一大心愿。幸赖学生孙西，数年之间，不避寒暑，兢兢业业于此事，终于帮助我将全部书稿整理、补充完毕。书稿一完，我心里顿觉欣然、踏实，八十高龄之人，竭尽鲁钝于学术，也许可以说是锲而不舍、鞠躬尽瘁吧。

我研究清前期中俄关系，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后来到昆明，在此时已迁到昆明的北平研究院工作。北平研究院的考古历史组在昆明郊区黑龙潭的一座古庙里，条件非常艰苦，但国难当头，正直的知识分子心中都充满民族正气，大家不仅无所求，而且奋力工作着。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倾全力于清前期中俄关系的研究。研究这个题目，觅寻材料困难，况且正值战祸之中。我主要利用了《东华录》等书，同时也参阅了一部英人英译的书《Some Early Russo—Chinese Relation》。在中西参照之下，我写了一些笔记，这便是我研究这个问题的第一步。在昆明住有一年后，我又回到当时已迁到成都的齐鲁大学，并一直工作了四年。在讲授中西交通史课程的同时，我又着重研究中俄关

系，写出一部未完成的讲稿。这部讲稿，实用力不少，但总觉不能尽如人意，原因在于受资料限制太大。解放后，我被分配到山东大学工作。新形势下，自己也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新方法，眼界比以前开拓得宽广了，照例该多做一点工作，尤其想做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工作。可是新形势下亦有新问题，限于各方面的原因，尤其自五七年后，竟使我难于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了。谁料，已是近八十老翁竟又逢科学上逐渐解冻的天气，我又复归讲台，教书育人，同时潜心学术，整理旧作。十年之间，不仅眼见一批批研究生成长、毕业，而且庆幸一部部书稿相继问世。到了后来，我唯一挂心的便是早年于流寓之中为之花费了心血的《清前期中俄关系》，总想尽快整理问世，了结此生心愿。惜乎人已八十高龄，体力终觉不支，肺气肿常使我痛苦难忍，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出身农家，上学迟，少机敏，然自幼养成勤苦的习惯，生活上向无所求，即使政治上蒙垢，亦能泰然处之，唯用心于学术之上。今见《清前期中俄关系》未能完稿，颇成心中一大憾事。幸在此时，我的诸位学生、也是现在的校、系领导，体察我的心境，决定选派已获硕士学位的孙西同志做我的助手，并确定她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我整理《清前期中俄关系》。孙西同志性情良善，对人忠诚，于学业上十分努力，跟我相处数年，成了我十分称心的助手和学生。我致力于教书凡六十年，所教学生甚众，然成绩卓然者区区可数。孙西是我晚年比较满意的一个学生。她在三年之中，按照我的建议，奔走各地图书馆，逐一检阅各类史料，进行踏踏实实的研究，一章一章反复补充、修改，并在每章改好后，亲自送到我的病榻前，细细地说明作了哪些改动以及改动的原

委。我在阅稿后再提出意见，和她讨论，供她再改时参考。在我，总希望通过这一工作，不仅改好书稿，而且能向她多少传授一些知识和方法，有益于她今后进步；在她，确也怀着对我的尊重，既能将工作做好，亦能注意学好。晚年有此师生之谊，令我感到满足。孙西理解我对此书关切的心情，以她尽心尽力的工作，使我终于能在一息尚存之时，看到全部书稿做完，给了我最大的精神安慰。我已别无挂心之事。孙西以九万余字原稿为基础，补成一部二十三万的完整著作，功不可没。但她一再要求不署自己的名字。我是执意应署二人名字的，这不仅名实相符，用意更在光大师生之间互敬互尊的传统，并用以纪念我们这两代人于前后五十年间相续的工作，它记录着我们读书人做一点学问的甘苦。

综览全书，我们不敢说做得好，但还是有一些特点的。首先，与我国已出版的同类著作相比，本书涉及清前期中俄关系的范围比较广阔，不仅写到了中俄两国在这一时期的军事冲突、外交条约的订结以及宗教关系，也写到了两国间的商业贸易活动、外交使团的互访以及留学生的派遣，等等，我们认为这对于全面认识这一时期的中俄关系是必要的、有价值的。其次，本书成书于八十年代，不仅使我们能够摆脱一些“左”的偏见，更注意忠于史实，而且可资利用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极为丰富，使我们有可能给自己的论点建立坚实的资料基础，像译自满文俄罗斯老档的《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康熙起居注》等就给了我们极大的便利。这是我们铭感在心的。最后，从写作态度上说，我们始终强调本书是学术著作，坚持唯物史观，坚持从史实中求是，是我们研究中所遵循的最高准

则，力戒为某一成说作注脚的非科学做法，因此，在本书中对某些历史过程作了我们认为比较客观的描述，并提出了我们认为比较科学的见解，这也就构成了本书的一些新意。当然，作为一种探讨，我们并不奢望它都一定正确，相反，我们希望得到批评、修正。

近年关于中俄关系的宏论大作不少，致使本书有些叙述已为众所周知，而有些问题，依然受资料限制，或简略而过，或论断不确，这些，都有待后来者匡正、弥补。学术总是做不完的，又总是后者居上的。

因为是为最后一部书写序，我还想借几行文字，向我的老伴李琼芳表示一点谢意。她虽不治史学，但我在数十年间能潜心史学却与她的照料分不开。尤其在我政治上遭遇坎坷后，她与我风雨同舟，患难与共，未曾有一句怨言。如今我常年辗转病榻，她寸步不离，细心护理，为系里同人所称道。她早已退休，且亦高龄，但何曾稍息一时。我能存活至今，工作至今，全赖她矣！我的每一部书，无不包含她的劳动，但从没有她的名字，今彰明此端，微表我心中有她。

张维华

1987年5月20日

##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最早来华的俄国使节.....	1
第二章 顺治年间沙俄侵入黑龙江流域 .....	21
第三章 康熙初年的中俄关系 .....	42
第四章 清军征讨入侵黑龙江流域的俄国人 .....	60
第五章 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	85
第六章 噶尔丹叛乱期间的中俄关系.....	116
第七章 义杰斯出使中国.....	132
第八章 《尼布楚条约》订结后来华的俄国商队 .....	145
第九章 边地中俄贸易情况.....	168
第十章 土尔扈特西迁与图理琛出使.....	181
第十一章 伊兹玛依诺夫及郎克出使经过.....	198
第十二章 萨瓦东来与《恰克图条约》的订结.....	215
第十三章 《恰克图条约》订结后的中俄贸易.....	267
第十四章 乾隆中的三次停市.....	293
第十五章 中国使团两次赴俄及土尔扈特部 回归祖国.....	308
第十六章 在华的俄国东正教会.....	338

## 第一章

### 最早来华的俄国使节

元代以前，俄罗斯这名字一直未见于中国古代史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与之相隔遥远，互相难于直接交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俄罗斯国家形成较晚，两国发生联系亦较晚。

清代以来，两国接触逐渐频繁，随之也出现了一些反映俄罗斯情况的记载。只是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这些记载大多失实。例如：清人何秋涛在《朔方备乘·尼布楚城考》中称“俄罗斯本乌孙种属”。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早在西汉初年，俄罗斯人先祖就已经与中国发生联系了。但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此言不确，乌孙与俄罗斯绝非同一“种属”。《魏书·世祖纪》中记载，真君四年三月壬戌乌洛侯国遣使朝贡。清人张穆在《鸟斋笔记》中称乌洛侯即俄罗斯，实际这也是出自主观臆想。俄罗斯既不属乌孙种属，也不是乌洛侯国，在西汉初年或魏晋时期与中国并无往来的可能。

要想了解中俄交往的发端，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俄国建国的历史。

俄罗斯民族是在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基础上，经过与其他民族的多次融合而逐渐形成的。其中北欧的诺曼人、芬兰人

以及自古生存在东欧平原上的各种族部落都是俄罗斯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俄国建国较晚，其历史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一、国家建立之前历史（公元九世纪以前）；二、基辅公国时期（公元九世纪至1240年蒙古军队攻占基辅城）；三、半封建时期（十三世纪初至十六世纪初。在这一时期，在东北部斯拉夫人与芬兰人逐渐融合成大俄罗斯族；南部形成了乌克兰族；西南部形成了白俄罗斯族。另外，到十四世纪，也产生了三种单独的语言：俄语、乌克兰语及白俄语<sup>①</sup>）；四、第一莫斯科时期（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伊凡三世至彼得大帝时期）；五、彼得堡时期（十七世纪至1917年十月革命）；六、第二莫斯科时期（1917年至现在）。

就活动范围来说，在十五世纪以前，俄罗斯各民族的主要活动舞台是辽阔的东欧平原。东欧平原被称为“陆地大洋”，它的北部为河流、森林、沼泽地，一直延伸到白海、北冰洋沿岸。西南以高加索高脉为界，南面则有黑海及里海。东欧平原南部是坦荡无垠的大草原，这里自古就是亚洲游牧民族活动、驻牧的地方。东欧平原向西、东双方畅开，西边的沼泽地区和东边的乌拉尔山脉都不是交通障碍，从沼泽地区引出一条干燥的陆地桥，它过斯莫凌斯克直达俄国中部地区。乌拉尔山脉以它起伏不大的山脉链，构成了通向西西伯利亚的舒适通道，这就为位于欧洲的俄国提供了大陆扩张的前提条件。东欧平原的地形与气候构成三个明显的地带：南部草原地带，北以森林、草原为界；中部杂林、如针叶林，草原间杂地带，适于

<sup>①</sup> Geschichte Russlands, 第64—65页。

农耕；北部冻土地带，农民不能生存。<sup>①</sup>

公元二世纪至七世纪之间，东斯拉夫人主要活动在喀尔巴阡山山脉周围，六世纪时他们还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在后来俄罗斯的土地上，曾有许多种族生存：在维斯杜拉河与德维纳河之间，曾经生息繁衍过立陶宛人和列特人。芬兰人则生活在北布格河到卡马河直至乌拉尔山西麓之间的北俄罗斯地区。二世纪以后，芬兰人逐渐移至今芬兰本土。在南部草原地带，一直有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存在。阿兰人曾经居住在高加索北端。顿河与库班河之间曾是马札尔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地盘。四世纪时，莫尔多瓦人居住在伏尔加河以西的地区。这些居民都是在公元四世纪以前活动在这里的。公元三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哥特人从西面和北面进入东欧草原。匈人于四世纪后半期渡过伏尔加河，征服了阿兰人和保加利亚人，赶走了哥特人。公元453年匈帝国消失后，阿瓦尔人又接踵而至。伊斯兰教产生后，阿拉伯人又来到高加索北部地区，它的北面是哈查尔人。七世纪时，哈查尔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河口地区，他们在波斯、拜占廷、黑海与波罗的海之间进行中间贸易。善于经商的哈查尔人曾对东斯拉夫人施加过重要影响。

七世纪以后，东斯拉夫人逐渐从喀尔巴阡山地区东迁，他们沿第聂伯河以及其他大河向东移动。不久，东斯拉夫人就广泛分布在第聂伯河、伏尔加河上游、德维纳河和伊尔缅湖地区，即东欧平原的中部和东部。从社会发展阶段上看，六世纪

<sup>①</sup> 见 Hans Von Rimscha: *Geschichte Russlands*, Darmstadt, 1972 第 1—5 页  
Manfred Hellmann: *RuBland*, Frankfurt, 1973 第 15—19 页。

以后，东斯拉夫人的氏族制度才开始逐渐解体，形成地区性的部落联盟。七、八世纪时，东斯拉夫人以部落、氏族公社为单位定居下来，主要从事畜牧业、渔猎采集业和耕作农业。九世纪以后，东斯拉夫人的氏族公社最后解体，出现农村公社“维尔福”。但是，在九世纪以前，东斯拉夫人一直没有形成国家。

公元八、九世纪时，北欧的诺曼人尚正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其首领率部众四处征讨，先后侵入西欧现在的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地区，同时也进入东欧。入侵东欧的诺曼人被称为瓦兰吉亚人。

公元862年，瓦兰吉亚人在军事首领柳里克率领下，攻占了东斯拉夫人建立的诺夫哥罗德城。不久，柳里克的亲属奥列格又沿水路南下，于882年攻占了东斯拉夫人的另一座城市——基辅，并把统治中心转移到这里。以后，柳里克的后裔征服了东斯拉夫人各部落，在此建立起基辅公国。因为瓦兰吉亚人被称为“罗斯”人，所以基辅公国又称“基辅罗斯公国”。“罗斯”一词源自“Rhos”，这是九世纪的拜占廷、阿拉伯文献中对来自斯堪地那维亚的瓦兰吉亚人的称呼，以示与东斯拉夫人的区别。“Rhos”一词实际与瑞典的一个地名“Roslagen”有关，芬兰人至今还称瑞典为“ruotsi”。在俄语中，“Rhos”一词称为“Rus”，所以东斯拉夫人称瓦兰吉亚人为“罗斯人”。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名称就源于“罗斯”一词。<sup>①</sup>

基辅罗斯公国的建立，对东斯拉夫人影响很大。东斯拉夫

<sup>①</sup> Hans Von Rimscha: Geschichte Russlands, 第10—11页。

人和瓦兰吉亚人（罗斯人）以及其他种族逐渐融合，逐步形成不同的种族和语言。基辅罗斯公国是在俄罗斯土地上建立的第一个国家。马克思曾说：“正如查理曼的帝国是现代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奠基的先导一样，柳里克王公们的帝国也是波兰、立陶宛、波罗的海国家、土耳其和俄国本身奠基的先导。”<sup>①</sup> 柳里克王朝建立后，俄罗斯逐渐由奴隶制尚未普遍展开的农村公社阶段，过渡到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柳里克王朝的再一重大影响，是使东斯拉夫人接受了基督教。东斯拉夫人原来信奉多神教，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了基督教中的东正教，并将东正教宣布为国教，自此，俄国成为一个信奉东正教的国家。

基辅罗斯公国是个松散的统一体，它不久就逐步解体。1054年雅罗斯拉夫大公死后，基辅罗斯公国的西部地区，形成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的一部分，中部和东部则分裂成几个公国。十二世纪时，基辅罗斯公国名存实亡，它被分成十几个比较大的公国，这些公国只在名义上尊基辅罗斯为宗主。这些公国计有：基辅、诺夫哥罗德、普斯科夫、佩雷雅斯拉夫、车尔尼戈夫、斯摩棱斯克、特穆塔拉干、穆罗姆、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加利西亚——沃伦等。

在俄罗斯国家形成的时期里，尚未发现中俄直接交往的史料。俄罗斯与中国发生联系，实际开始于蒙古人西征。强大的蒙古帝国不仅在中俄关系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使中、俄

<sup>①</sup>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301—308页。

两国共同处于同一皇帝统治之下达一世纪之久。<sup>①</sup>

公元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进行横跨欧亚大陆的远征。在征服中亚和高加索之后，蒙古军队进入南俄草原。1223年，俄罗斯诸侯联军与蒙古军在卡尔卡河畔交锋，一方是由速不台大将率领的仅三万人的蒙古先头军队；一方是由加利西亚、基辅及车尔尼戈夫所统率的，另有其他六个诸侯所参加的诸侯联军，军队人数达八万人，远远超过对方。然而双方一交锋就使俄军大吃一惊，蒙古人的战术是他们所从来没见过，也没学过的，并且强悍无比。其结局可想而知。在阿拉伯资料中记载了这次大战。联军被彻底打败，六个诸侯和六十个贵族战死，基辅所派出的一万一千人的军队几乎无一生还。整个联军只剩下了几千人。<sup>②</sup> 俄军惨败。

然而，蒙古人并没有大举乘胜进军。俄国诸侯对此估计不足，以为蒙古人不会再来了。十一年后，蒙古人就又开始大举西进。

据《元史》所载，元太祖十八年，“速不台上奏，请讨钦察。许之。遂引兵绕宽定吉思海，展转至太和岭，凿石开道，出其不意。至则遇其酋长玉里吉及塔塔哈儿方聚于不祖河，纵兵奋击，其众溃走。矢及玉里吉之子，逃于林间，其奴来告而执之，余众悉降，遂收其境。又至阿里吉河，与斡罗思部大、小密赤思老遇，一战降之，略阿速部而还。”<sup>③</sup> 记载的就是这

<sup>①</sup> 见 Michel, N. Pavlovsky: Chinese - Russian Relations, New York, 1949, 第1页。

<sup>②</sup> 见 Geschichte Russlands, 第88—89页 RuBland, 第73—75页。

<sup>③</sup> 《元史》卷一百二十一。

次大战。这次交锋是蒙古人征服俄罗斯的第一仗。蒙古人虽然获胜，但不久即退回蒙古。蒙古人地处北疆，又善于在草原间纵横奔驰，其北击俄罗斯在客观上起到了打通中俄交往的作用。

蒙古人第二次西征俄罗斯在太宗八年（1236年）。1227年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即皇帝位，因钦察、斡罗斯等部没有降服，遂命拔都为统帅，速不台随从，统领十五万蒙古军，俄国人记为三十万军队，再次出师征讨。<sup>①</sup> 八年二月，大军西进。速不台首先在1236年攻入伏尔加河畔的保尔加尔 Bolgaren（《元史》作不里阿耳），这个有五百多年历史的城邦，在一天之内即被拔都的军队荡平。然后，拔都挥戈直逼俄罗斯平原。首当其冲的梁赞诸王公虽奋力抗击，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拔都纵军屠城，据传有二十七万人被杀，梁赞王公玉里也战死。接着在1237年冬天轮到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特维尔，再后进至莫斯科城下。莫斯科一带土地肥沃，林木丛生，不易行军，蒙古王公命士卒斩木凿道，其宽度可使三辆车并行。蒙古军在莫斯科城下架炮攻城，城中军民一时慌乱胆怯，不战自降。蒙古人纵兵大掠，屠杀无数。自此役后，蒙古军队轻骑四出，攻掠城池，每战必胜，被击者纷纷投降。拔都又率军北攻诺夫哥罗德，行军至离城百余里处，因林木掩蔽，阻塞难行，又因为天暖冰雪融化，道路泥泞，行军万分困难，故不战而退，诺夫哥罗德幸免于难。1240年拔都率军来到基辅城下。基辅城是当时俄国最重要、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白色城墙高

<sup>①</sup> 见《新元史》卷三。

耸，城内有礼拜堂三十处，金塔矗立。蒙古人称基辅为“阿勒台八什汗努姆”，意思是金顶汗之邦。蒙古军到达后，基辅王迈克尔并没有组织有力的反击，反而携众逃往匈牙利。于是众人推选德米特里领导守城。蒙军攻城多日，城陷后居民多被屠杀，罗斯古都也毁于一旦。这样，从1236至1240的五年间，蒙古军队攻占了除诺夫哥罗德以外的俄罗斯全境。战争给俄罗斯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并且干扰了俄罗斯经济、文化的发展。那么，蒙古军队为什么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呢？约·弗·巴德利在《俄国·蒙古·中国》一书中曾分析说：“俄罗斯之所以遭到兵燹之灾，说来说去是因为一个四分五裂的王国是无法站住脚的。”的确，众多的公国，又互不团结，是难于抵挡军气正盛的蒙古军队的。这一分析很有道理。

1241年后，蒙古军队继续西侵，兵分两路攻入波兰和匈牙利。1241年春，一部分蒙古军队先渡过维斯杜拉河，攻陷克拉科夫，然后再渡奥得河，进占布累斯劳。4月9日，在利格尼兹附近大败波兰、德国和条顿骑士团联军。与此同时，拔都率领蒙军主力于3月攻入匈牙利，攻陷佩斯等城，然后渡多瑙河，入奥地利，抵威尼斯，一直推进到离罗马城只有数公里的地方。欧洲各国一片惊慌，首当其冲的罗马教皇速派人为拔都送去巨额金银珠宝，请求不要攻城，罗马才幸免于难。1242年2月，窝阔台去世，死讯待传至军中时，拔都决定率师东返。蒙古人这才未能饮马塞纳河。西征也至此停止。但是，欧洲人彻底领教了蒙古人的军威，从此也就留下了“黄祸”论。

1242年，回到南俄草原的拔都，以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为首都，建立钦察汗国（1242—1480年），又称金帐汗国，被

征服的俄罗斯各族都隶属于钦察汗国统治之下。凡是俄罗斯各王公嗣位，都要先至萨莱谒见，再至大都朝觐。因为俄罗斯北境天气寒冷，水草枯乏，无法放牧，拔都于是以奥卡河为界，规定河南由钦察汗自领；河北由原来当地的贵族首领治理，不过需要承认蒙古是他们的宗主国，并需每年上交一定的贡赋以示臣服。

元宪宗继位以后，决定进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控制，于是把在其他地区实行的统治制度扩及到俄罗斯。1251年，蒙古大汗派出官员到俄罗斯各地进行详细的户口调查，登记造册，作为征税、出夫、征召兵员的依据。调查户口之后，蒙古人在俄罗斯建立起达鲁花赤制度，分别委派十户长、百户长、千户长和万户长来治理各地。这一制度受到俄罗斯人的普遍反对，到十四世纪初即废除，改为委派俄罗斯贵族作为有名无实的大公，用以代替蒙古人的直接统治。

蒙古人还在俄罗斯推行征收什一税的制度，称为“jasaq”俄语称“desjatinnaja”农民及土地所有者交实物、商人、手工业者交商品。对于畜牧业，则规定马牛羊百取一，对于居住在森林地区的人，则规定每人每年贡纳五张毛皮。这些赋税均由征税吏征收，征税更多为花刺子模、土耳其斯坦、布哈拉等地的人，他们仗势欺压当地人民，中饱私囊，因而一再引起人民的反抗。<sup>①</sup>如在诺夫哥罗德、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等地都爆发过反抗蒙古人及征税吏的斗争。

蒙古人的征讨是一种流血的交往方式，这并不值得赞许，

<sup>①</sup> RuBland, 第78—84页。